

JIAOJU YIN、SUNWEISHI
XUEXISHIJIAN
SISHITIXIBIJIAOYANJIU

焦菊隐、孙维世学习实践 斯氏体系比较研究

梅斐◎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CHINA THEATRE PRESS

焦菊隐、孙维世学习实践 斯氏体系比较研究

梅斐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CHINA THEATR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焦菊隐、孙维世学习实践斯氏体系比较研究 / 梅斐
著. —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9.5
ISBN 978-7-104-04786-5

I. ①焦… II. ①梅… III. ①焦菊隐(1905-1975)
—戏剧理论—研究②孙维世(1921-1968)—戏剧理论—研
究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研究 IV. ①J82②J8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81458号

焦菊隐、孙维世学习实践斯氏体系比较研究

责任编辑: 齐 钰
策划编辑: 高 峰
责任印制: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 版 人: 樊国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天宁寺前街 2 号国家音乐产业基地 L 座

邮 编: 100055

网 址: www.theatrebook.cn

电 话: 010-63385980 (总编室)

传 真: 010-63383910 (发行部)

读者服务: 010-63381560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天宁寺前街 2 号国家音乐产业基地 L 座

印 刷: 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60千字

版 次: 2019年5月 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04-04786-5

定 价: 68.00元

序

这部专著的作者梅斐，是我们中央戏剧学院的校友，他曾在中戏导演系学习三年，在我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这部专著就是在他自己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写成的。作者于二〇一二年考入中戏导演系时还没有写出什么有分量的学术文章。他平时说话不多，态度谦和，给人做事认真的印象。

一年后博士生要选择研究课题做论文了，可能是受我影响，他想要在“斯氏体系在中国”这个大的课题研究中选择一个论题。该课题的研究需要积累并阅读大量资料，较难找到新的研究视角，短时间内也难以取得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我向他谈到了这些，但他还是坚持要进行这个课题的研究。

是啊，这类基础性的研究总是要有人来做的。他埋头做了差不多两年，初稿写了三十多万字，经过不断梳理论述线索与章节之间的内在逻辑，博士论文的文稿形成了现在的基本架构。

作者以“焦菊隐、孙维世学习实践斯氏体系的比较”为题，是为了认清这两位通过学习、运用斯氏体系原理创造出优秀舞台演出的导演艺术家的各年不同的艺术特色，认清学习“体系”的正确道路与有效方法，指出中国戏剧在学习西方戏剧的道路上所取得的成绩，以及今后前进的方向。应该说这个研究目的在一定程度上是实现了的。

作者在深入研究了两位导演艺术家的舞台艺术作品后指出，焦菊隐在舞台实践过程中确立了“诗意的真实”的导演风格；孙维世在理论阐述与总结中提出创造“活人的戏剧”的艺术追求。在实践中，焦菊隐根据表现艺术大师哥格兰的部分表演理念，吸收斯氏的“有机行动”的原理，提出了著名的“心象说”创作方法；而孙维世则依据斯氏“有机行动”基本原理，指导演员们通

过寻找真实的形体行动和正确的形体自我感觉“生活于角色”，从而诞生出具有“再体现”美学品格的表演艺术。焦菊隐运用斯氏“最高任务”学说，成功地运用综艺手段创造出了具有民族特色的《茶馆》；孙维世根据斯氏“形象种子”原理，有机地将剧本中的每一幕、每一场戏贯串起来，创造了饱含诗情的《保尔·柯察金》。

焦菊隐、孙维世是率先探索我国民族演剧美学，并且提出各自对于未来民族演剧理想的实验学者。在实验中，焦菊隐主张借鉴传统戏曲艺术，建立“中国学派”演剧艺术的舞台梦想；孙维世希望能够结合民族戏曲和民间艺术，创造出我国观众“喜闻乐见”的戏剧的“民族形式”。专著作者不仅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并在自己的教学和创作中努力进行学习借鉴与实验创新。

作者相信，未来的戏剧家们只有获得对人的独特体验，产生了强烈的表现生活的愿望，才能找到鲜明的形式与行之有效的手段。我国演剧艺术工作者们，需要真的从心灵深处“捧”出对于“人”的真实体验，才能真正让戏剧艺术重新获得生机与繁荣。

我期待这一天的到来。我还期待并相信这部专著的作者在不远的将来，能在创作、教学和研究上取得新的成绩。

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主任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姜涛

二〇一九一月二十二日

绪 言

话剧艺术——作为有别“以歌舞演故事”的传统戏曲形态，传入我国已历百年有余了。所以一部中国现（当）代话剧历史，也是以我国学习西方先进演剧方法作为主线的历史进程。而这其中对于我国舞台艺术最具影响的，就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学习实践斯氏体系，不仅使得我国舞台产生出了一批优秀的话剧作品，而且还诞生了不少深刻影响演剧事业的导演大师，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焦菊隐、孙维世。

影响焦菊隐认识话剧、进而学习斯氏体系的指导老师，是安·巴·契诃夫的戏剧作品。阅读契诃夫的戏剧作品不仅让焦菊隐以“文学道路”认识现实主义演剧艺术，而且使得“安·巴·契诃夫的影响”成为焦菊隐研究当中的重要领域。孙维世自幼学习表演，后随斯氏传人尼·戈尔恰科夫学习导演。孙维世的“表演、导演创作道路”，从而使得“尼·戈尔恰科夫的教益”成为今天我们认识孙维世艺术创作的基础课题。在契诃夫、戈尔恰科夫的影响之下，焦菊隐、孙维世运用斯氏体系基本原理创造出了《夜店》《一场虚惊》等优秀演出。以《夜店》《一场虚惊》为代表的一批演出，已经成为我国演剧 20 世纪 40 年代所创造的话剧艺术经典作品。通过深入比较研究“安·巴·契诃夫的影响”“尼·戈尔恰科夫的教益”，能让我们进而看到：话剧《夜店》、小秧歌剧《一场虚惊》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显露出了焦菊隐、孙维世的导演才华，而是使得我国演剧获得“现实主义戏剧艺术”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启蒙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演剧开始按照写实原则学习“体系”。焦菊隐在舞台实践过程当中，确立起了“诗意的真实”的导演风格；孙维世在理论

阐述与总结中,提出创造“活人的戏剧”的艺术追求。通过分析并且比较“诗意的真实”“活人的戏剧”这样两个导演课题,也让我们从而了解:焦菊隐、孙维世在实践中和理论上不仅确立了各自具有核心意义的导演命题,而且由此树立起了我国演剧学习实践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美学旗帜。

在实践中,焦菊隐根据表现艺术大师哥格兰的表演理念,吸收斯氏“有机行动”原理,提出著名的“心象说”的创作方法。在排演中,孙维世依据斯氏“有机行动”基本原理,指导我国演员通过寻找真实的形体行动和形体自我感觉“生活于角色”,从而诞生了具有“再体现”美学品格的表演艺术。通过比较认识焦菊隐指导演员实践“心象说”和孙维世带领演员奔向“再体现”,能让我们深入认识斯氏体系“要在演员作为‘人’的‘有机天性’之中诞生人物形象”的基本内涵,以及我们今天表演领域的主要问题。

焦菊隐运用斯氏“最高任务”学说,成功地把表演、台词、布景、灯光、音响和道具等艺术手段全部统一起来,创造出了具有民族诗意的《茶馆》的舞台艺术。孙维世根据斯氏“形象种子”的原理,有机地将剧本中的每一幕戏、每一场戏连接贯串起来,从而生发饱含诗意激情的《保尔·柯察金》的经典演出。通过比较认识焦菊隐、孙维世的导演艺术,不仅能让我们认识导演创造“完整、统一的演出形象”的基本任务,而且也让我们认清斯氏体系——“要在有机行动之中创造演出思想任务”的最终目标。

焦菊隐、孙维世是率先探索我国民族演剧美学,并且提出各自对于未来民族演剧理想的实验学者。在实验中,焦菊隐主张通过学习、借鉴传统戏曲艺术,建立“中国学派”演剧艺术的舞台梦想。在探索中,孙维世希望能够结合民族戏曲和民间艺术,创造我国观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深入分析与比较研究焦菊隐、孙维世的民族演剧艺术实验,既让我们透过这些舞台探索看到两位导演对于民族演剧未来的美好憧憬,也让我们通过比较认识严重制约两位导演探索之路的内在原因,从中看到深刻影响我国演剧长远发展的根本问题。

学习实践斯氏体系让焦菊隐、孙维世成为热情反映生活,表达人民真挚心声的导演大师。然而因为之后的社会环境,并且由此引起对于斯氏体系基

本态度的种种变化，让焦菊隐、孙维世从关注现实、批判生活和指引我国学习先进演剧方法的实践导师，逐渐变成探索舞台演出形式与表现手段的实验学者。而在极“左”思潮盛行的影响之下，艺术家们逐渐失去对于现实生活进行独立判断的基本权利，以致最后主动放弃自己对于现实生活的独立思考，最终将使话剧艺术萎缩成宣讲传播。

焦菊隐、孙维世的舞台创造与艺术历程告诉我们：首先，戏剧家们只有获得自己对于现实生活与人生的独特体验和心灵感触，并且产生真挚与强烈的表达愿望之后，才能产生出表达情感的独特形式与鲜明手段。相比探索民族舞台演剧美学这一课题，我国演剧要从心灵深处“捧”出对于“人”的生命体验，才是使得戏剧艺术获得生机与繁荣所要面对的根本问题。其次，要在扎实掌握科学演剧方法的基础上，创建民族独特舞台演剧艺术。任何一种艺术形态，都有形成这一特殊形态的固有品格之“根”。而只有从“根”部进行“培植”与“浇灌”，才会使得戏剧艺术的“种子”在我们的民族文化土壤里面破土发芽、开花结果。斯氏“有机行动”原理，就体现着戏剧之“根”——演员的“有机天性”。

搜集本书研究资料的过程之中，本书作者整理出了“焦菊隐、孙维世学习实践斯氏体系”资料索引，并且将之编为附录。

前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话剧艺术已在多个方面取得突出成就。与此同时，也让人们看到一些长期未能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在近些年来，由于青年演员、导演和从业人员的创作能力令人堪忧，使得不少戏剧学者与行业专家认为：已经到了通过学习斯氏体系对于我国演剧进行“重新启蒙”的关键时刻。^①那么面对重新学习，我们又该从哪里入手？

契诃夫说：“俄罗斯人是没有文化的，我们对于黑格尔的每句话都不愿意放过，可是我们对于托尔斯泰却不甚了了。”^②契诃夫的话告诉我们：判断一个民族是否具有深厚文化，要看他们是否真的了解与认识到自己民族的文化巨人。而在我国学习实践斯氏体系的进程之中，不仅创造出了一批誉为经典的舞台作品，而且还诞生了像焦菊隐、孙维世这样了不起的导演大师。^③

焦菊隐年少酷爱契诃夫的戏剧作品，并由契诃夫开始学习斯氏体系演剧艺术。早在“桂林—江安”时期，焦菊隐不仅翻译、校对《契诃夫戏剧集》，而且翻译出了斯氏《演员自我修养》（第一部）法文版和聂米罗维奇-丹钦科

① 王晓鹰：《斯氏表演体系的发展历史以及对中国话剧现状的意义——在“斯氏体系与北京人艺”研讨会上的发言》，《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崔宁、刘章春主编），中国戏剧出版社，2012年，第69页。

② 童道明在“佐临戏剧理论暨导演艺术研讨会”上的发言，《话剧》，1995年，第1期，第6页。

③ 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舞台实践中，学习借鉴斯氏体系最为成功的两位导演是北京人艺的总导演焦菊隐和中国青艺的总导演孙维世。因为他们两人对斯氏体系的精华了解得更为透彻，而且又都有自己独特的艺术追求。”详见童道明：《斯氏体系与北京人艺（代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崔宁、刘章春主编），中国戏剧出版社，2012年。

《回忆录》，并且通过《一年间》和《哈姆雷特》等剧的导演创造，留下我国演剧早期学习斯氏体系浓墨重彩的一笔。一九四七年，焦菊隐以话剧《夜店》的舞台艺术成功掀开我国探寻“掌握先进演剧方法”道路上的崭新一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焦菊隐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兼西语系主任与戏剧音乐系教授等职，并且专门开设、讲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讲座”等课，成为一名深入研究斯氏体系创作方法的戏剧专家。

一九五一年，焦菊隐受“北京人艺”首任院长李伯钊之邀，导演老舍先生的剧本《龙须沟》获得巨大成功。话剧《龙须沟》的出色排演，不仅开创焦菊隐“诗意的真实”的导演风格，而且奠定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美学传统。在这之后，焦菊隐积极带领“北京人艺”青年演员跟随苏联戏剧专家鲍·格·库里涅夫学习斯氏体系，并且参与教学剧目《耶戈尔·布雷乔夫及其他的人们》的导演工作。焦菊隐还不遗余力地探索建立民族演剧美学，不仅留下《虎符》《茶馆》和《蔡文姬》等开拓演剧视野的舞台作品，而且还提出了建立话剧艺术“中国学派”的远大梦想。

孙维世自幼学习表演，后赴苏联主攻导演，并且跟随斯氏传人尼·戈尔恰科夫教授进行“心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系统训练。回国之后，孙维世就导演出了大受好评的《一场虚惊》。而这一出小秧歌剧，也成为了我国演剧学习斯氏“有机行动”创作原理的首部作品。

一九五〇年，年仅二十九岁的孙维世担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导演，并且凭借话剧作品《保尔·柯察金》的舞台创造震动剧坛，成为我国演剧系统运用“心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所创造的首次演出。在此之后，孙维世又以其非凡的艺术才能导演出了《钦差大臣》《万尼亚舅舅》《大雷雨》和《一仆二主》等一批经典剧目，成为指导我国演剧学习“心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示范演出。在总结中，孙维世提出“活人的戏剧”主张，成为一面指导我国演剧学习“心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美学旗帜。孙维世还积极协助莫斯科艺术剧院导演、来自苏联的戏剧专家——普·乌·列斯里执教中央戏剧学院导演干部训练班，培养出了首批掌握“心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中国专家。一九五六年，孙维世受命成立中央实验话剧院，并对创造我国观众“喜闻乐见”

的话剧“民族形式”做了诸多有益实验，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价值。

焦菊隐、孙维世是在我国学习“体系”时间较早、舞台成就特别突出、艺术贡献尤其卓越的导演大师。学习“体系”的艺术历程，不仅使得两位导演创造出了一批经典的艺术作品，而且还留下了一笔极为丰富的学术思想，特别是让“焦菊隐、孙维世学习实践斯氏体系比较研究”成为今天一项极有价值的研究课题。比较研究焦菊隐、孙维世的学习和创作历程，也在回顾我国话剧的发展历程。尤其是在我们需要通过学习斯氏体系进行“重新启蒙”，并想找到一个正确方向与路径的时候，通过认识与比较焦菊隐、孙维世的学习实践进而认识斯氏体系的内在精髓，也就有了极为宝贵的研究价值与学术意义。

本书将从话剧传入我国的历史节点入手，梳理分析我国演剧处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以焦菊隐、孙维世为主要代表的戏剧导演通过学习实践斯氏体系曾为我国演剧带来哪些生机与希望；深入研究焦菊隐、孙维世的导演创造和艺术理论（本人著作、排演记录、演出描述和我国学者的研究文章），认识分析两位大师对于戏剧艺术根本问题的深刻思考；讨论后世学者对于焦菊隐、孙维世的研究工作，并且判断我们是否已经通过这些研究认清深刻影响我国戏剧长远发展的主要问题。希望通过比较焦菊隐、孙维世的艺术历程与导演创造，并且立足戏剧艺术长远发展的认识高度，分析我国演剧现状与所存在的一些根本问题，讨论斯氏体系对于我国演剧事业发展的重要价值。

关于本书的研究对象。斯氏“有机行动”原理，被看作是能够打开“心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大门的一把“钥匙”。所谓“有机行动”，是由人的目的驱使而产生的行为活动。概括起来，它有三个基本特性：第一，它是根据目的驱使而产生的行动。这就要求演员调动本人的“心理—形体天性”创造行动的原因与根据，而非表现行动的形式与结果。这样一个基本特性，也就形成斯氏体系“要在演员作为‘人’的‘有机天性’之中诞生人物形象”的美学品格与基本目标。第二，它是能够完成演出思想任务的行动。而这也这就要求演员、导演和各个艺术创作部门，必须要以“贯串行动”和“最高任务”

作为基础创造形象。第三，它是可以孕育完整艺术形象的行动。它不仅能培植角色的“性格种子”和演出的“形象种子”，还能将之发展成为“性格形象”和“演出形象”。这样三个特性，就构成了斯氏“根”之导演学派——“要在有机行动之中创造演出思想任务”的核心内涵；而它又把斯氏体系的各个部分统一起来，从而形成一个基于“人”的“有机天性”客观规律的创作方法。而焦菊隐、孙维世的学习和创作历程，就是帮助我们认识斯氏“有机行动”原理的珍贵教材。

为了完成“掌握先进演剧方法”的历史任务，我国演剧从20世纪开始自觉介绍、学习与实践斯氏体系。焦菊隐、孙维世是我国较早开始学习实践斯氏体系的代表人物。在契诃夫戏剧作品的影响之下，焦菊隐以“文学道路”开始认识话剧艺术进而学习斯氏体系。大学毕业之后焦菊隐任“北平戏曲专科学校”校长，之后远赴法国留学——专攻戏剧。归国之后的焦菊隐由斯氏体系的介绍者逐渐成为一位在实践中成就突出的戏剧导演，并且成功导演出了与契诃夫风格相近的话剧作品《夜店》与《上海屋檐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焦菊隐，进行导演艺术创造的同时还在翻译与校对他所喜爱的契诃夫的戏剧作品。所以要对焦菊隐有所认识，也就要对契诃夫有所了解。孙维世自幼开始学习表演，还在上海、延安剧坛显露出了表演才华，后赴苏联跟随斯氏嫡系传人戈尔恰科夫学习导演，并以“表演、导演创作道路”学习“体系”。回国之后的孙维世，已从当年的青年演员变成一位深刻掌握斯氏原理与创作方法的戏剧导演。二十九岁的孙维世以戈尔恰科夫对于导演艺术的工作教益，创造出了《保尔·柯察金》的示范演出。创作之余，孙维世还着手翻译她的老师戈尔恰科夫的理论著作编订教材。因此展开对孙维世的研究工作，首先就要对戈尔恰科夫有所认识。所以本书将以“安·巴·契诃夫的影响”、“尼·戈尔恰科夫的教益”作为分析焦菊隐、孙维世学习实践斯氏体系的讨论基础和研究起点，认识契诃夫、戈尔恰科夫对于焦菊隐、孙维世的导演艺术道路都产生了那些重要影响，焦菊隐、孙维世如何通过学习实践斯氏体系回应时代命题，以及焦菊隐、孙维世的学习实践对于今天演剧又有什么深刻启示。

焦菊隐、孙维世通过学习斯氏体系，产生出了独树一帜的导演风格。焦菊隐在实践当中准确把握“舞台真实”的精神内涵，创造出了高度凝练与概括的艺术真实——“诗意的真实”。孙维世在阐述当中首次提出戏剧是要表现“人”的艺术，要在舞台演出当中创造“活人”——“活人的戏剧”。本书将以具有代表意义的舞台创作和理论阐述，比较认识“诗意的真实”与“活人的戏剧”的美学内涵，以及它们对于认识 and 解决我国演剧当前问题的重要价值。

焦菊隐的“心象说”，一直被认为是“发展”斯氏体系的成功典范。一九五一年排话剧《龙须沟》的时候，我国演员通过实践“从生活出发——修正、充实和发展演员对于角色的‘心象’”的基本道路，塑造出了具有鲜明性格特征的人物形象。而一年前，孙维世已经通过指导我国演员遵循“从自我出发——在演员自己身上培养出人物性格”创作道路，诞生出了具有“再体现”美学品格的“活人”。本书希望通过比较研究焦菊隐的“心象说”与孙维世的“再体现”，深入认识斯氏体系“要在演员作为‘人’的‘有机天性’之中诞生人物形象”的基本内涵，从而认识今天我国表演艺术的主要问题。

运用“最高任务”学说，焦菊隐成功搭建起了一座《茶馆》的思想艺术“大厦”；实践斯氏“形象种子”学说，孙维世出色创造出了《保尔·柯察金》焕发诗意激情的演出艺术。深入分析焦菊隐、孙维世的导演工作，能让我们进而认识斯氏“根”之导演——“要在有机行动之中创造演出思想任务”的核心内涵。

在实践中，焦菊隐逐渐提出建立话剧艺术“中国学派”的远大理想，孙维世开始实验具有独特“民族形式”的中国话剧。本书将以焦菊隐、孙维世的探索实践作为基础认识各自的民族演剧之梦，并且分析深刻影响两位导演探索道路的主要因素。

关于本书的研究方法。分析焦菊隐、孙维世对于斯氏体系基本原理的学习实践，将会运用比较文学所开创的“比较研究”基本方法。比较文学，是以研究跨越民族界限、跨越学科界限的各种文学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新

兴学科。^①它的目的在于通过比较研究两个或者多个民族的文学艺术独特现象,探讨文学艺术的基本规律。由于本书不仅要斯氏体系和“焦菊隐、孙维世的学习实践”进行比较,同时还需要将焦菊隐、孙维世两位导演的舞台创造进行比较,甚至还必须将我国演剧的历史足迹和当前现实进行比较,由此得出作者本人对于舞台艺术基本规律和对影响我国演剧发展的根本问题的认识与思考,所以本书也将运用比较文学所开创的“比较研究”基本方法。

但是运用“比较研究”的基本方法,并不意味着本书将是“比较文学”或者“比较戏剧”的专门著作。这是因为本书的研究对象乃是同一民族文化环境之下的两位导演(即是“焦菊隐、孙维世”),而并不是不同民族文化环境之下的两位导演(例如“斯坦尼、焦菊隐”或者“斯坦尼、孙维世”等等)。

在讨论中,本书将会主要运用“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两种方法。所以运用“影响研究”的方法,而这主要因为本书将要分析“作为外来文化的斯氏体系”都从哪些方面深刻影响我国演剧的发展历程。这是因为“影响研究”,本身就是“研究那些经过吸收、消化之后,与自己的作品水乳交融的外来影响”^②的基本方法。所以运用“平行研究”的方法,主要因为本书要将斯氏体系和“焦菊隐、孙维世的学习实践”进行比较,同时还需要将焦菊隐、孙维世两位导演的学习和创作历程进行比较认识,甚至还必须将我国演剧的历史足迹和当前现实进行比较认识,得出作者对于我国演剧当前问题的思考。因为“平行研究”,就是要将那些“相似”“类似”和“卓然可比”的不同文学艺术加以比较,得出有益结论的基本方法。^③俄国、中国两种不同文化环境下的演剧艺术,焦菊隐、孙维世各自的舞台艺术实践和我国演剧“昨天”与“今天”的相互对照,都决定了本书将要运用“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方法。

而在“比较研究”的领域之中,有将“阐发研究”融入“比较研究”基本方法的新的趋势。近些年来,我国台湾学者首先提出的“利用西方有系统

① 陈惇、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9页。

② 陈惇、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11页。

③ 陈惇、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29页。

的文学批评来阐发中国文学即中国文学理论”^①的研究方法开始受到普遍重视。本书运用斯氏体系演剧艺术的成功经验来对我国演剧进行分析，又用焦菊隐、孙维世的艺术实践深入认识斯氏体系基本原理，还要通过对焦菊隐、孙维世彼此进行相互论述。所以这种“双向”阐释，就会涉及要运用到“阐发研究”的基本方法。

作为对于“影响研究”方法的发展，“接受研究”开始进入比较文学的方法范畴。所以注重“接受”因素，主要就是因为“影响这一概念给人的印象是被动的、强加的，而接受则是基于接受者主体结构的主动行为，对一部作品的接受可以揭示不同文化体系的特点，也可以反映出不同接受者的个性，通过接受研究还可以考察时代变化，或可能改变文学史的写法，新的文学史可以成为一种文学思潮或者作品的接受史”。^②本书要以焦菊隐、孙维世作为接受主体，认识斯氏体系对于我国演剧的发展影响，特别是要结合我国时代特点和审美主体个性，也就必然要在“影响研究”的同时，结合运用“接受研究”的基本方法。

另外，接受主体除了民族主体、历史主体和个性主题之外，还有一个戏剧艺术的固有主体——观众。所以本书除了讨论焦菊隐、孙维世对于斯氏体系的接受之外，还会讨论我国观众对于焦菊隐、孙维世运用斯氏体系创造演出的欣赏与接受。而这，也是戏剧学科所独有的研究对象。

最后，由于“误解、误读等，体现着民族主体的接受形态”，所以本书还将我国演剧对于斯氏体系的“误读”作为考察和研究的一个领域。在一方面，接受主体“是以自己的审美个性去消融外来戏剧的东西”，^③所以焦菊隐、孙维世对于如何实践斯氏体系都有自己独特的创造与发挥。正如卢卡奇所说，“真正的影响永远是一种潜力的解放”。^④另一方面，民族审美主体的“误解、误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选编：《比较文学论文选》，第43页。陈惇、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44页。

② 肖明：《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学术讨论会综述》，《文学评论》，1987年，第6期。转引自田本相主编：《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年，第14页。

③ 田本相主编：《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年，第20页。

④ 田本相主编：《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年，第20页。

读最能显示民族主体在接受外来影响时的作用，最能说明民族主体在接受外来形象所表现的偏移、夸张、曲解，反常甚至歪曲等等错综复杂的接受影响形态”，所以我国演剧对于斯氏体系创作方法的“误解”与“误读”，也是本书需要涉及和讨论的一个重要方面。

因此进行比较研究的时候，本书将以“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为主，比较认识焦菊隐、孙维世对于斯氏体系的学习实践和导演创造。与此同时，本书还会深入分析我国演剧对于斯氏体系的“接受”，以及焦菊隐、孙维世各自对于斯氏体系的“接受”，并且进行相互印证的“双向”阐释，所以本书还需要把“接受研究”和“阐发研究”结合起来运用。除此之外，诸如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等传统方法，仍是本书将会运用的研究方法。

综上所述，本书将以“比较研究”的方法为主，综合运用传统研究方法，力求站在纵览我国现（当）代演剧历史的认识高度，学习运用全面、辩证和历史的认识观点统领“焦菊隐、孙维世学习实践斯氏体系比较研究”的这项工作，并且希望能够得出对于我国戏剧长远发展的真诚思考。

Contents 目录

序 / 1

绪 言 / 01

前 言 / 05

第一章 学习斯氏体系的道路 / 001

第一节 安·巴·契诃夫的影响 / 003

一、从契诃夫开始的学习 / 003

二、由契诃夫走向斯坦尼 / 013

三、《夜店》的导演工作 / 031

第二节 尼·戈尔恰科夫的教益 / 036

一、喜爱戏剧艺术的孩子 / 036

二、戈氏导演教益的影响 / 045

三、一次清新的导演创造 / 067

第二章 对于写实原则的把握 / 080

第一节 追求“诗意的真实” / 083

第二节 创造“活人的戏剧” / 094